

伊朗现代化的困顿与突围 ——礼萨·汗与霍梅尼改革比较^{*}

● 桑碧桃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协调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伊朗的老大难问题。礼萨·汗国王时期的西化改革,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斯兰共和国也在艰苦地寻找协调这对环节的结合点和平衡度。本文试图通过对比礼萨·汗的改革和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政策,得到一些协调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启示。

关键词:伊朗; 现代化; 礼萨·汗; 霍梅尼; 改革

中图分类号: D73/7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58(2006)02-0112-03

一、不同的历史使命

早在19世纪下半叶,伊朗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感到要阻止西方进一步渗透就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萌生立宪思想。到1906年时形成了一股要求立宪的洪流。在1906~1911年的立宪革命中,伊朗政治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伊朗历史上第一届国民议会制定了伊朗的宪法,宪法规定,王权来自人民,议会是全体人民的代表,议会在法律、预算、借款、租让权等一切问题上拥有否决权。国王可以解散议会,但不可以不召集议会。人民有受教育、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但不得违背伊斯兰教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宗教法院之外,另成立世俗法院;公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1]宪法宣布什叶派教义为伊朗国教,内阁大臣必须由穆斯林充任,并成立了一个由5名高级僧侣组成的委员会,审查议会所提出和通过的法律草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精神。^[2]这表明什叶派教义是伊朗的主流思想,教士代表着传统的势力,以便使议会在伊斯兰教许可的范围内运行。

如一切受西方冲击的国家一样,伊朗需要复兴。而复兴只能是向西方学习,这是一切希望振兴的国家都要走的路。但伊朗在走上复兴之路时,却套上了传统主义的枷锁。这就是君主专制和独裁,这为以后阿亚图拉霍梅尼推翻巴列维王朝埋下了伏笔。

巴列维的第二代国王一手巩固专制统治,一手进行现代化建设,使得伊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但是他推行的西方化政策,使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生活方式严重冲击了伊斯兰传统,引起了一些宗教势力的不满。特别是有关土地

改革方面的规定,使拥有全国1/3左右土地的清真寺和宗教机构受到了巨大损失。政府加强城镇和农村基层政权的措施和严禁毛拉集团参与政府的规定,极大地削弱了毛拉的权力。于是国王与毛拉的领袖霍梅尼之间爆发了一场政治斗争。

国王欲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强国的野心和任意扩大经济发展计划的做法,造成伊朗经济恶性膨胀,加之国内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王室阶层日趋腐败,国王迷信军队、警察的镇压力量和石油美元的支持,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反对,得罪、远离了社会各个阶层。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了反国王的运动。霍梅尼的任务就是纠正巴列维王朝的失误,改变西方化的做法,走出一条适合伊朗国情的路来。

二、各具特色的改革措施

1. 政治制度方面

礼萨·汗本想仿效凯末尔,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但由于传统势力的反对,他建立了君主制。建国之初就受到传统势力的干预,这显然不是好兆头。他创建了伊朗现代军队,实现了军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收回了被外国势力攫取的国家主权,维护了国家权益;1928年彻底废除了领事裁判权;1934年实现了海关业务管理人员伊朗化,宣布实行关税自主;收回了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部分石油租让权、捕鱼权、经营电报公司特许权;取消了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1938年,将全国分为四十九州,合为七省;颁布土地登记法、商法、刑

* 收稿日期: 2005-11-11

作者简介: 桑碧桃(1981-),女,甘肃临洮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东近现代史。

法,通过征税、征兵、强制定居、逮捕和处决,拉拢和利用等手段,对付部落的分离运动和反抗,并对非伊朗部落和民族实行波斯化政策。同时,改善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祆教徒的处境,使其享有公民权。

1979年霍梅尼上台后,废除君主制,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并通过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新宪法基本体现和实现了霍梅尼的政治思想。选举制、任命制、推荐制和审查制并用,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民主制;专家会议、监护委员会等集体负责制有效地阻止了独裁专制;总统、总理实行任期制;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和以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色。

国家的暴力机器开始伊斯兰化,建立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革命卫队、革命法庭。霍梅尼始终对旧军队不信任,大批清洗旧军队,由教士担任政委以伊斯兰思想改造旧军队,并派代表严密控制军队。国家的行政机构也被伊斯兰化,国家把“依据伊斯兰教义行动的善良、虔诚的为被压迫大众服务的认真负责的人选拔上来”^[4],并设立了伊斯兰指导部。在伊斯兰会议中,教士及支持教士的人占绝对优势,基本实现了伊斯兰化。司法制度伊斯兰化:废除旧王朝制定的一切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和规定,制定伊斯兰刑法,任用经过宗教训练的青年教士为法官,并设立了司法学校。

2. 经济方面

礼萨时期,1928年成立了国家银行,以后又开办了专业农业银行,支持农业经济的发展。颁布了机器进口免税法、扶助民族工业企业法、对外贸易专营权等法令,支持民族工业发展。1930年开始建设现代化工业,1940年已有1902家工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乎国计民生的工业都建了起来。这些大多数是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能力很不相同。“由于伊朗工业缺乏技术人员和工厂经理,所以礼萨统治之下的工业发展是不能满意的。”^[5]在交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伊朗的第一批工业总算建立起来了,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伊朗经济伊斯兰化开始于1979年的大规模国有化运动。1980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通过“土地分配法案”,同意把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高中生和农学院毕业生、公务员和其他想种地的人。到1988年,很多农民获得或租到了土地。政府控制了国际和国内贸易,垄断了机械、金属制品、纸张、木材、基本食品和纺织品等多种进口商品,反对投机和囤积居奇,对22种商品限价,对违法的商人、私有企业主、公家企业主罚款,直至取消营业执照。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经济伊斯兰化过程中,传统、保守的内容越来越少,伊斯兰的控制和影响也不如其他方面强烈,而适应伊朗当代国情、适于现代化发展的措施却很多。可以说是在伊斯兰教原则指导下的具有伊朗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举措。

3. 社会生活及教育

礼萨试图把宗教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降到一个次要位置。他在司法、教育、慈善事业、清真寺地产方面打击和限制教士的权力和实力;没收教产,用之来资助学校、医院、国营工业和其他国营企业。1935年成立德黑兰大学,农学院和师范学院,通过

发展现代教育,粉碎了宗教教士和毛拉们通过教育控制公众的手段。法律世俗化,关于婚姻的宗教法律也受到限制,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礼萨采用欧式服饰,废除妇女戴面纱,提高妇女最低婚龄,允许妇女离婚。在文字等文化领域用古波斯文化来代替伊斯兰文化,推行世俗化改革。

礼萨·汗的改革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的现代化。“伊朗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的社会。其现代化不得不采取输入外来文明的形式。而输入外来文明则不可避免地引起代表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教士的强烈反对。”^[6]在改革过程中,他不能正视和善待伊斯兰文化,这是必须批判的。

伊斯兰共和国把妇女戴面纱作为政治行为加以推行。根据传统,9岁以上的妇女外出要戴面纱,并穿宽松的能罩住形体的服装,最好能穿黑色长袍。梅哈内伊曾说“反对这次革命的人已把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集中于发展妇女的放纵和颓废。”^[7]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使用化妆品,穿短裤或透明尼龙长袜、禁止男人穿短袖衬衫。当局为女性设计了带头套的神色伊斯兰校服,在社会生活中严格实行两性隔离,违者要受到训斥、鞭笞。恢复一夫多妻制,女子结婚的最低年龄由16岁降为13岁。革命初期,大部分音乐、棋、扑克被视为非伊斯兰文化而予以禁止。

伊斯兰共和国为了控制社会舆论,严格限制非伊斯兰的新闻出版,大力扶植伊斯兰新闻出版,严格控制电影事业,霍梅尼强调大学要伊斯兰化,他说:“伊朗所有的大学应服从于一个高尚的革命,所有与西方有联系的教授都应清除,大学应成为学习伊斯兰科学的中心”^[8]。1980年4月,关闭了大学,查封了60个研究所,审查教授及学生对神权政府的看法。伊斯兰共和国在此方面的作为,太过偏激,总的来看,改革退回到传统保守中去是很不现实的做法。

三、改革的成效比较

礼萨·汗、霍梅尼不同的改革措施,反映了对现代化、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礼萨·汗的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结束了伊朗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悲剧,启动和促进了伊朗的现代化建设。他使积贫积弱的伊朗重新焕发出活力,使伊朗获得新生,不愧为伊朗“现代之父”。但在建国之初,伊朗的两大传统都未受到损害:一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二是宗教与国家不可分离。“巴列维国家从一开始就深陷在传统主义的泥淖中,在政治与精神方面无所创新。”^[9]

礼萨·汗上台之时,伊朗经济千疮百孔,贫弱不堪。礼萨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财政,国家的财政持续改观,收入从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增加到1931年的4亿里亚尔,出现盈余。国家投资兴建了一批纺织厂和加工食品原料的小型工厂,是伊朗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礼萨执政前,伊朗全国只有250公里铁路,1938年已达到了1700多公里,包括著名的纵贯伊朗大铁路。1900年,伊朗全国只有1200公里公路,而在1923年—1938年间修筑的公路就达4000公里,并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

礼萨是个现代化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对此后人自有公论。礼萨“怀抱着一个信念,就

是让伊朗获得新生并且引导它走向进步”^[10]。礼萨领导了一场没有根基的现代化运动。这种现代化是强制的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形式的君主强迫伊朗接受现代化,而民族的主体却被动迟延,不肯向前迈步。改革以国王命令的形式强制推行,下层执行者处于被动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以野蛮的手段冲击强大而保守的传统社会,推行现代化的改革。

霍梅尼通过全面推行伊斯兰化,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控制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使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行为全面伊斯兰化。伊朗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大量参与,公民选举议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参政、议政、决政。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霍梅尼力图纠正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失误,注意社会公平、稳步发展,强调经济独立自主。通过分配、租让土地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到 1990 年 12 月,国家共向 22 万农户分配了 125 万公顷的荒地,农用地和暂时耕地,有 13 万公顷土地永久性的转移到了 2 万农民手中。国家没收了巴列维王室及有关的财产,实行银行、保险公司的国有化和钢铁、化学、造船、飞机制造、矿产等战略性企业的国有化。工业、贸易和第三产业领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政府加强了控制和干预经济活动的的能力,制定了有关劳动保险、最低劳动年龄、最低工资等的法律条文,保障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势群体的利益,并在近年开始注意现代市场机制的作用。

伊斯兰共和国禁止饮酒、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整顿了社会风气,培养健康、良好的社会风尚。一些极端守旧的做法如禁止男女各种各样的接触,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在后来也略加调整。拉夫桑贾尼说:“为了使社会得到发展,我们必需打破传统的习俗。”^[11]当权者坚决反对妇女穿短裤或透明尼龙长袜等,在实际生活中也大打折扣。拉夫桑贾尼认为:“爱美之心和修饰打扮是人人都有 的真实感情。反对这种感情不是真主的愿望”^[12]。这说明统治者也意识到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应正视、尊重、满足人性正常的需求,这正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之一。

1982 年 10 月,大学在关闭两年之后重新开学,高等教育的结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虽然没有根本变化,但大学及教授的思想受到当局的严密控制。这说明伊斯兰共和国主观上想用伊斯兰化彻底改造大学,但客观上无能为力,只能从政治、思想上控制大学,从文化上加强伊斯兰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灌输。霍梅尼强制伊斯兰化严重影响了伊朗教育的发展,如入学人数大大减少,教授、专家大批外逃等,阻碍了伊朗现代化的进程。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其他领域才会逐步现代化。在社会生活及文化方面,显露出极端民族化的倾向,这是一种狭隘、保守、封闭的文化民族主义。

四、结论

礼萨·汗的改革促使了政治现代化;经济改革把西方的法典引入以伊斯兰神权为主导的伊朗社会;社会习俗改革触动了伊斯兰传统文化,抛弃了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引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体现了世俗化和西方化的精神。“伊朗进步的时代就此开始,这个时代在十年之内补上了几个世纪的不

足。”^[13] 再来看霍梅尼的作为。霍梅尼推行全面伊斯兰化政策,似乎要把国家的一切恢复到伊斯兰传统中去,但事实怎样呢?霍梅尼的全面伊斯兰化是建立在巴列维王朝工业化基础上的。其中的‘伊斯兰’已不是默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而是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这个‘伊斯兰是继承了 1300 多年伊斯兰的基本原则,以及 1200 多年前什叶派的基本教义’^[14],经过霍梅尼等人的注释与阐述,溶入了许多现代革新思想的伊斯兰。在政治上结束了君主制,建立了在教法学家领导下的共和制。他反对巴列维王朝对外失去民族气节,在外交、经济、文化上坚决维护民族尊严、独立和主权。他憎恨前王朝现代化生活中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试图利用伊斯兰的公正、公平和抑富济贫的原则,照顾城乡穷人的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他对巴列维王朝现代化中的社会生活荒淫无度和腐朽、腐败深恶痛绝,试图用伊斯兰教义和暴力净化社会。

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纠正失误、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领导者往往矫枉过正。在后来的实施中,又作了适当的调整。所以说,伊斯兰既有合理进步的成分,也有保守落后的东西。但是,时代在进步,伊朗的传统与现代化将会越来越适应社会的需要。

传统性存在于伊朗民众中,怎样把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文明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 20 世纪以来伊朗国家领导人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传统性与现代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如何协调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使国家在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的过程中保留自己民族的传统中的精华呢?这就需要当权者在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保持渐进的改革速度;使传统性中的精华能够与现代化互相沟通;使传统中保守内容的群体性的思维行为定势逐渐与现代化的思维行为方式相沟通,逐渐转化为现代化的人的思维行为方式,接受现代化,支持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冀开运, 蔺焕萍. 二十世纪伊朗史[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42.
[2]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31.
[3] Timar Kuran,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Economy, in Fundamentalisms and the State : Remaking Politics , Economies and militance, ed. By Martin E. Marty and R. Scott Apple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93, p. 306.
[4] 彭树智主编, 王新中, 冀开运著.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362.
[5] [美国] 西·内·费希尔. 中东史(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01.
[6] [7] 彭树智, 王新中, 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277, 370.
[8] Ali Rahnama and Farhad Normani, The Secular Miracle[M]. Zed Books Ltd. London and New Jersey, 1990: 128.
[9] 钱乘旦. 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J]. 世界历史, 1998(3).
[10] 钱乘旦. 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J]. 世界历史, 1998(3).
[11] John Obert Voll Isla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295.
[12] John Obert Voll Isla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290.
[13] 卡尔·布罗克尔曼. 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565.
[14] 冀开运. 论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1).